

k296.58

M86

香港，让历史告诉未来

总策划 黄崇岳
执 笔 莫小培
暨远志



A0770755

海天出版社

责任编辑: 刘东力

封面设计: 张幼农

责任技编: 卢志贵

书 名 香港, 让历史告诉未来

著(编)者 深圳市博物馆
出版发行者 海天出版社
地址 深圳市彩田南海天大厦
邮编 518026

印刷者 深圳市宣发印刷厂
开本 850mm×1168mm 1/32
印张 12
字数 300 (千)
版次 1997年6月第1版
印次 1997年6月第1次
印数 1—5000册

I S B N 7-80615-678-X/G·184
定 价 20.00 元

前 言

20世纪是一个翻天覆地的世纪。

曾经在人类的历史上创造过辉煌文明的埃及、中国、印度等东方大国在本世纪里经过一次又一次血与火的洗礼，终于打碎了套在脖子上的殖民枷锁，挺起了自己的脊梁。而以不列颠帝国为代表的西方列强几个世纪建立的世界殖民体系则正逐步土崩瓦解，灰飞烟灭。国家要独立，民族要解放，是不可逆转的历史潮流，也是20世纪政治史的主旋律。

1997年7月1日，香港将回归祖国，这是世界史上具有深远意义的大事。它不仅将洗雪炎黄子孙的历史耻辱，实现中国人民的百年梦想，它还是殖民主义制度彻底崩溃的标志之一，也是两个不同社会制度的国家通过谈判，和平解决历史遗留下来的问题的范例。

江泽民总书记说过：“一个民族如果忘记了自己的历史，就不可能深刻地了解现在和正确地走向未来。”这是何等精辟的论述啊。

《香港，让历史告诉未来》不仅是一部香港史，一部中英关系史，还是一部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史。它用大量的史实披露了英国殖民主义者如何凭借其坚船利炮，打败了腐朽的清王朝，把《中英南京条约》、《中英北京条约》、《中英展拓香港界址专条》等不平等条约强加在中国人民头上，割占了

香港和九龙半岛，强行租借了新界。本书还披露了抗日战争时期国民党重庆政府曾向英国政府进行过许多的交涉，争取收回九龙和香港，但是这一努力由于历史的原因没有成功。而亿万中国人民始终没有停止自己的斗争，从自发的小规模武装反抗，到全民族的觉醒；从对西方列强抱有幻想到高举反帝废约的旗帜，中国人民奋斗了一百多年，才在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下推翻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和官僚资本主义三座大山，实现了国家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提高了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1984年，中英两国政府签订了《中英联合声明》，决定中国于1997年7月1日对香港恢复行使主权，中国还创造性地提出了“一国两制”的政策，以保持香港的繁荣与稳定。

这一切为什么会发生？是怎么发生的？它给人们以什么启示？各国的政治家、历史学家都将认真思考，人民也将会认真思考。

香港的历史昭然揭示了这样一个朴素的真理：只有通过人民的觉悟与斗争，只有以强大的政治、经济、军事实力作为坚强后盾，一个国家才能自立于世界民族之林，才能维护其主权与尊严，实现其领土的完整与人民的自由、幸福。

《香港，让历史告诉未来》是一部普及性的历史著作，它想让广大的青少年记住中华民族屈辱的前天，英勇奋斗和获得辉煌胜利的昨天，以及珍惜来之不易的今天，认识自己肩负的重任，发愤学习，努力工作，在即将到来的21世纪里，把四大文明古国之一的中国建设成繁荣、昌盛、文明、强大的社会主义国家。

第一章 早期中英关系的发展

18世纪，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和封建中国的交往日益频繁，两个世界，生产力发展水平不同，社会制度不同，文化传统不同，差距和矛盾十分明显。西方资本主义国家要把中国变为它们的商品市场和原料供应地，要把中国变为殖民地；而封建的中国则站在自卫的、防御的立场上。历史的进程有其客观的规律，斗争的结局不决定于抽象的正义原则，而决定于双方力量的对比和较量。中国由于自身经济的落后和政治的腐败，注定会在斗争中失败，不可能维护自己的主权和独立。

19世纪初，西方殖民主义国家对中国的侵略活动日益猖獗。而腐败愚昧的清政府依然墨守成规，闭关自守，继续做着“天朝上国”的迷梦，终于在这场关系到国家、民族尊严的斗争中处于被动的地位。

第一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国与英国

鸦片战争前，中国是清王朝统治下的一个独立、统一的中央集权的封建国家。在中国封建社会中，小农业和家庭手工业相结合的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在整个社会经济中占着主要地位。农民不但生产自己需要的农产品，而且生产自己需要的大部分手工业品。随着商品经济的发展，在封建社会内部孕育着的资本主义萌芽逐渐增长。丝织、棉纺织、陶瓷、冶炼、造纸等部门

出现了具有资本主义因素的手工工厂。但是，在封建生产关系的桎梏下，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因素发展缓慢，地主阶级占有大量土地，农民则很少或完全没有土地。乾隆、嘉庆年间，大学士和坤占地8000余顷。至于占地几千、几万亩的地主，为数就更多了。大量土地集中在地主手里，使得大批农民失去土地，沦为佃农或流民。而地主对农民的剥削愈加沉重，当时的地租率竟高达50%以上。农民日益贫困，过着牛马不如的奴隶般生活。因此，农民与地主之间的矛盾趋于尖锐，社会更加动荡不安。

过速的人口增长，也成为严重的社会问题。公元1651年（顺治八年），全国人口大约6000万，到康熙时突破1亿，1793年（乾隆五十八年）猛增到3亿以上，1834年（道光十四年）已超过4亿。在不到200年的时间里，人口增加了6倍以上。嘉庆年间，全国人均耕地2亩多，道光年间已下降到不足2亩，这也造成流民增多，加剧了社会的动荡。

自18世纪下半叶开始，清王朝已经走上衰败的道路，吏治日益腐败，大小官吏贪污成风，营私舞弊，贿赂公行。乾隆时揽朝政二十多年的权臣和坤，用各种手段积累了大量的不义之财。据清代官场传抄的和坤处死前一天的一道上谕，嘉庆承认收到查抄和坤家产的清单，共109号，内有83号没有估价，已经估价的只有26号，就值银2.2亿多两，相当于当时清政府3年的财政收入。至于那没有估价的83号总计值多少亿银两，则又落入嘉庆的腰包。因此，民间流传：“和坤跌倒，嘉庆吃饱。”地方官员巧取豪夺，也是无孔不入，当时民间有“三年清知府，十万雪花银”的谚语。

清朝军队也很腐化，武备废弛。鸦片战争前，清王朝拥有22万八旗兵和66万绿营兵。但不论八旗还是绿营，都已腐败不堪。军官不理营务，克粮昌饷，花天酒地。士兵不勤操练，许多人竟

吸食鸦片，聚开赌场。北京的八旗兵，终日游手好闲，雇人顶替当班。外省军队，甚至出现了骑兵没有马，水勇不习水，武器生锈，炮台失修的严重现象。若遇检阅操演，骑兵便临时雇寻马匹，水勇雇寻渔户冒名顶替。至于沿海水师，也大都老弱无用，战船多半是薄板旧钉钉成的，遇击即破。这样腐败的军队，根本没有战斗力。

广大人民的生活每况愈下，阶级矛盾日益尖锐。自18世纪末到19世纪初，农民的反抗斗争连续不断。其中规模最大的白莲教起义延续9年，义军曾转战川、湘、鄂、陕、甘、豫六省。

正当清王朝国势日趋衰微的时候，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却非常迅速。在西方的资本主义国家中，又以英国工业发展水平最高。

英国在1640年爆发资产阶级革命，第一次在欧洲的一个大国推翻了封建统治。而后，资本主义势力与封建势力经过半个世纪的反复较量，才确立了资产阶级的统治地位和资本主义制度。1784年瓦特发明蒸汽机，英国出现工业革命。机器工业逐渐取代了工场手工业，生产关系和社会结构也发生了急剧变化，工业生产的发展突飞猛进。从1770年到1841年的70年间，英国棉纺织业用棉量增加了100倍，交通运输业也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铁路和轮船等现代交通工具开始普遍使用。煤、铁等其他工业产量也迅速增加。据统计，1820年英国工业生产量占世界工业生产总量的50%，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18%；1839年，英国的煤产量是法国、比利时、普鲁士三国总和的三倍；1840年，英国贸易占世界贸易总额的25%，生铁产量达139万吨。英国成为世界上最先进、最强大的资本主义工业国家。

西方资本主义的发展，始终伴随着暴力和掠夺。马克思曾一针见血地指出：“掠夺是一切资产阶级的生存原则。”随着资

本主义的迅速发展，资产阶级开始寻找新的商品销售市场和原料供应市场，开拓更为广阔的殖民地。列宁也曾指出：“资本主义如果不经常扩大其统治范围，如果不开发新的地方，并把非资本主义的古老国家卷入世界经济的漩涡之中，它就不能存在和发展。”

第二节 鸦片战争前的中英关系

15世纪末，欧洲发现通达东方的新航线。从此以后，西方殖民主义国家相继航海东来，掠夺东方财富，开辟殖民地。远东的海权和商业，16世纪为葡萄牙人所独霸，17世纪为荷兰人所操纵，到18世纪主要落在英国人的手里。这些西方殖民主义者都把中国作为他们在远东进行掠夺和侵略的重要对象。

葡萄牙人首先来到中国。1514年，第一艘葡萄牙商船开到广东，此后来华的商船陆续不绝。葡萄牙人到中国不久，就公然在沿海劫夺行旅，掠卖平民，占据海岛，暴露了当时洋商的海盗面目，引起中国人民的憎恨，遭到中国军队的驱逐。1553年，葡萄牙商人借口遭遇风暴，要求在浪白澳曝晒水浸货物，并乘机贿赂明朝广东按察使汪柏，人居我国的澳门。1557年，葡萄牙殖民者竟自设官府，建造城垣，修筑炮台，窃据澳门为殖民地。但是，当时中国对澳门还拥有完全的主权，承审澳门的民刑案件，派员在澳门征收税饷。在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由于清政府只准外国商人在贸易季节（阴历五、六月到同年九、十月）在广州居住，其余时间住在澳门，因此澳门也是来华各国商人的共同居住地。

西班牙商船第一次到中国是在1575年。在此以前他们已占领菲律宾，使其沦为殖民地。由于葡萄牙人阻挠他们在广东通

商，中国一度开放福建漳州（厦门）作为对西班牙贸易的口岸。西班牙人是残暴的殖民主义者，从1603年到1762年，先后五次大规模地屠杀在菲律宾的中国人，死难最多的达几万人。1626年到1641年，它还强占了台湾的北部。

1601年，荷兰商船第一次到中国，因受葡萄牙人的阻挠，没有达到在广东通商的目的。荷兰殖民者一开始便对中国抱有领土野心。1604年和1622年，曾经两度占领澎湖，1624年还强占台湾，在岛上建立残暴的殖民统治，直到1661年才被郑成功所驱逐。1688年，清政府因荷兰曾在清军攻取台湾的战争中协助作战，一度开放广东、福建的海口，允许他们通商。1793年荷兰人在广州设立商馆。他们的残暴行为和葡萄牙、西班牙一样，引起中国人民的强烈反感。

英国商船首次来华是在1637年。还在1635年12月，英王查理一世授权海军上校威德尔率领武装商船4艘赴中国贸易，并指示威德尔：“凡属新发现的土地，如果占据该地能为朕带来好处与荣誉，即代朕加以占领。”1636年4月，船队离开英国时，威德尔曾获得葡萄牙政府的许可，准备通过澳门，与中国进行贸易。但是，当他们于1637年6月到达澳门的时候，却被当地的葡萄牙人所拒绝。于是，威德尔不顾一切，1637年8月6日开到珠江口，闯入内河，想到广州直接进行贸易。经过虎门炮台时，明朝守台将士遵照凡外洋船只进口，必先经过广州当局批准的命令，喝令英船停止。但威德尔不听警告，一意孤行。守将只得开炮制止，威德尔开炮回击。经过几小时的炮战，炮台就失守了。威德尔带领人马上岸，占据炮台，并在附近乡村抢劫财物和粮食。广东当局闻讯，立即调集大军，准备反攻，并勒令威德尔等退出炮台，交出抢劫的财物，才准进口。威德尔因急于到广州做生意，只得遵命。威德尔等开船到广州，作了第一次交易，出卖了一些

糖、酒、布匹等货物。这个半商人、半海盗的威德尔算是到广州的第一个英国人。

中英第一次通商，就是这样在英国资产阶级的炮舰政策的威胁下达成的。此后，到广东的英船不多。

1699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在广州设立商馆。在这个公司的经营下，英国对华贸易迅速发展起来了。他们积极活动，还企图把贸易范围扩大到当时已经开放的广州、漳州、宁波以外的地区去。从18世纪初开始，英国对华贸易就占首要地位。第一次鸦片战争前的中外贸易关系，主要就是中英贸易关系。

1757年，清政府为了保护封建经济，限制外国人的活动，规定对外贸易只限于广州一口，并采取了一些防范外国人的具体办法。1759年，英国商人洪任辉到宁波要求开港，浙江巡抚接到乾隆帝命令，勒令拆掉定海的“红毛道头”，将英船驱逐出口。洪任辉十分愤怒，乘船直抵天津，呈书乾隆皇帝，仍求宁波通商，并且揭发广东的粤海关积年规弊。乾隆帝下令对粤海关官员严加查处，又把洪任辉押回澳门，监禁了三年，然后驱逐出境。

清政府限定广州一口通商之后，逐步健全了广州通商制度，即由公行垄断对外贸易。公行是专营对欧美贸易的洋行共同组织起来的。加入公行的洋行习惯上称为“十三行”，其实它的数目历年不同，并非恰好十三家。

公行在清政府对外关系上，起着一种特殊的作用，一方面，清政府给予参加公行的商人以承销外洋进口货物和代办内地出口货物的独占权；另一方面，公行对清政府承担一定的义务，其中特别重要的几项是：它担保外商缴纳税饷，负责约束外人在广州的居住和行动，以及充当清政府与外商之间一切交涉的中间人。清朝统治者利用行商避免与外国商人发生直接关系，防范外来势力的侵入。

英国商人对广州通商制度不满，指责它妨碍了英国贸易的发展。他们急切地要求，在广州以外的地方取得一块居留地，认为这是进一步扩大对华贸易的关键。英国政府经过长期考虑，1787年决定派卡思卡特中校出使中国，其主要使命是向清政府要求割让一块土地，作为英国的通商据点。这是英国第一次准备正式向中国提出割地要求。

1787年8月，卡思卡特接到使华任务后，就索取居留地一事向英国政府提出具体建议。他主张：为了避免引起中方疑虑，最好的策略是把地点的选择留给中国政府自行决定。英国方面只须提出，该居留地应便于英船安全到达，便于收购中国茶叶、生丝、瓷器等产品，环境有利于健康。

在此之前，东印度公司曾有人建议，从葡萄牙手中夺取澳门，使其成为英国“在东方无与伦比的港口”。卡思卡特认为夺取澳门并非良策，因为葡萄牙人在澳门并没有获得全部占有权，而且这种特权的转让未必能得到中国认可。加上澳门只有一个重要港口，又远离中国生丝和茶叶产区，他主张最好不要选择澳门。

卡思卡特认为，厦门邻近产茶区，位置适中，便于英国出售和收购商品，又有良好港湾，是最合适的地点。但如果中国反对英国割取厦门，也可以把居留地建在中国帆船可以直达的外洋海岛上。

1787年11月3日，英国国务大臣西德尼向卡思卡特发出训令，指出英国对广州通商制度感到不满，“希望在比广州方便的地方获得一小片土地，或一个与大陆分开的岛屿”，作为英国的商业基地。如果中国同意割让，卡思卡特即以国王的名义予以接受，同时要设法获得“最有利的条件”：英国应在该地享有设警权，并按照英国法律对英国臣民行使裁判权。要十分慎重地确

定居留地的地点，该地应便于英船安全航行，便于出售运去的英国货，并靠近上等茶叶产区，位置在北纬27——30度之间，具体的地点由卡思卡特酌情选定。西德尼的这一训令，和盘托出了英国政府企图通过外交谈判，割占中国东部岛屿的如意打算。

卡思卡特使华的全部费用由英国东印度公司提供，1787年12月，使团乘“维斯塔”号快速战舰启航。1788年6月1日，卡思卡特在途中病逝，使团返回英国。

1791年，英国政府以乾隆80寿辰为名，决定派遣马戛尔尼率团出使中国。马戛尔尼历任英国驻俄大使、上院议员和印度马德拉斯总督等要职，是一名资深政治家。英国特派马戛尔尼出使中国，说明它对这件事相当重视。

启程前，英国国务大臣邓达斯训令马戛尔尼，规定了访华的具体目的，主要是：

1. 在靠近茶叶、生丝生产区和毛织品消费区的地方，割占一、二块土地，供英商居住，英国在居留地内行使管辖权。

2. 同中国订立商约，开放多口通商。如有可能，应将英国贸易扩大到全中国。

3. 中国不得催逼公行偿还欠英商的债务（商欠）。

东印度公司作为使团的主要赞助者，也指示：

1. 开放华东口岸，废除公行制度。

2. 在广州索取一块地方，供英国海员居住，并由东印度公司管辖。

1792年9月26日，马戛尔尼从英国朴次茅斯港出发。1793年7月25日到达天津大沽，8月5日在大沽上岸。因使团带有一份共计600箱的厚礼，乾隆帝感到非常高兴，指示直隶总督亲自到大沽迎接，一切供应全部从优。清朝以“英吉利贡使”相待，要求觐见皇帝时，行三跪九叩大礼。马戛尔尼极力反对。最后，双方

达成协议：马戛尔尼等用谒见英王时最恭敬的礼节，即免冠鞠躬屈一腿，觐见皇帝。9月14日，乾隆帝在承德避暑山庄万树园接见了马戛尔尼。

9月21日，使团又前赴北京。10月3日，马戛尔尼根据英国政府和东印度公司的指令，向清政府呈递了一份备忘录：

1. 允许英国派员常驻北京，学习教化，照管英国商务。
2. 允许英商到宁波、天津等地通商。
3. 允许英商在北京设立商馆，收贮货物。
4. 将舟山附近一个不设防的小岛让给英国，以便英人居住和存放货物。
5. 在广州附近拨给一处地方，居住英商，或准令寄住澳门的英国人自由出入。

.....

十分明显，马戛尔尼全部要求的中心目的，就是要进一步为英国商品打开中国市场，马戛尔尼的这些要求，当然遭到清政府的拒绝。

10月7日，乾隆在给英王敕书中，拒绝了一切要求。他指出“向来西洋各国及尔国夷商赴天朝贸易，悉于澳门互市，历久相沿，已非一日。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特因天朝所产茶叶、磁器、丝斤，为西洋各国及尔国必需之物，是以恩加体恤，在澳门开设洋行，俾得日用有资，并沾余润。”对于英国索地一节，乾隆尤其愤慨，严正指出：“天朝尺土俱归版籍，疆址森然，即岛屿、沙洲，亦必划界分疆，各有专属”，驳斥了英国的领土要求。

乾隆帝的敕书，一方面体现了天朝唯我独尊、闭关自守的观念和政策。这个政策就其实质说，是封建社会自给自足的自然经济结构的反映，它阻碍了必要的中外经济交流，不利于社

会经济的发展。但是，另一方面，这份敕书也维护了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

马戛尔尼在承德、北京停留一个半月，交涉未获结果。10月7日离开北京，沿运河南下，经杭州到广州。1794年1月10日，从广州乘船回国。9月5日返抵伦敦。

1816年，英国政府应东印度公司的请求，又向中国派出以阿美士德为首的使团。国务大臣卡斯卡累指示阿美士德，要求取消公行制度，开放多口通商，公使进驻北京等。并未重提领土要求；但是东印度公司的“机密商务委员会”致信阿美士德，就使团的任务提出详尽的指示性意见，其中明确地提到夺占岛屿问题。东印度公司认为，“如果中国粗暴地把我们拒于对华贸易的门外，……那他们就不必指望我们会继续采取被动的态度。他们必须明白，对于我们来说，没有比占领中国东部有价值的岛屿，特别是台湾和琉球更容易的事了。这将使我们截断他们与亚洲诸国之间的全部海上贸易，并给北京一带造成恐怖。”这些凶恶的语言生动地反映了英国殖民主义者的领土扩张野心。不过东印度公司也估计到，这样做必将引起中国人的憎恨，可能妨碍英国贸易在中国大陆的扩展，因此它对夺占岛屿一事暂时仍持等等看的态度。

1816年2月，阿美士德使团自英国出发，同年8月29日到达北京。嘉庆帝在圆明园正大光明殿等待接见英国使节，阿美士德不愿行跪拜礼，随后又托病不到，嘉庆帝认为他们傲慢无礼，派人遣送英国使团回国。阿美士德经过运河、鄱阳湖、梅岭，于1817年1月1日到达广州。1月23日，到达澳门，随后回国。

英国政府三次遣使到中国，要求割让海岛，开放多口通商，订立商约，与清政府的立场相距甚远，为后来双方矛盾的加剧埋下了伏笔。1833年，英国国会决定取消东印度公司的对华贸

易垄断权，这一法案定于次年4月22日生效。在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取消以前，中英之间的关系主要是商贸，就英国方面来说，对华贸易的代表者，在伦敦是东印度公司的董事会，在广州是东印度公司的大班。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特权被取消后，在伦敦由英国外交部代替以前的东印度公司董事会，来处理有关对华贸易问题，同时英国政府认为必须在中国成立一个机构，来代替以前东印度公司的大班。

1833年12月，英国政府任命律劳卑为驻华商务监督，并以东印度公司前驻广州大班德庇时、罗宾逊为第二、第三商务监督。英国设置驻华商务监督，直接隶属外交部，不仅由它来执行以前东印度公司大班的职务，并且借此通过广东的地方当局和清政府建立正式外交关系，来达到增开口岸，扩大中英贸易的目的。律劳卑是英国贵族、上院议员、海军高级官员，英国政府派遣律劳卑到中国来，并以熟悉中国情况的德庇时、罗宾逊充当助手，表明英国将以政府的身份出面，推行对华政策。

律劳卑启程前，英国外交大臣巴麦尊训示他，要求在中国开辟商埠、推销鸦片、获得海军据点。1834年7月15日，律劳卑到达澳门，8天后，他违反惯例，不经清政府同意，径直驶到广州。清朝统治者知道律劳卑是“夷官”而不是普通的大班之后，就更加严格地要求律劳卑遵守原定一切中外交涉必须通过行商的规定。但律劳卑打破这一惯例，要清政府与他直接建立关系。当两广总督卢坤以停止中英贸易的“封舱”方法加以拒绝时，律劳卑便以大炮来威胁清政府。9月5日，律劳卑命令2艘英国兵船，强行驶入珠江，轰击虎门炮台，并煽动在广州的英商，支持他的侵略行为。但他的行径并没有得逞，律劳卑不得不屈服，退回澳门，不久就病死了。

律劳卑死后，德庇时（1834年10月—1835年1月）、罗宾逊

(1835年1月—1836年12月)相继充任英国驻华商务总监。他们根据在东印度公司工作的经验,决定采取更稳妥的侵略手段,这就是他们所标榜的“相安无事”政策。这个政策的特点就在于他们竭力与清政府进行谈判,暂时与清政府维持和平的关系,以此来扩大鸦片走私,等待时机,发动侵华战争,实现武力扩张的目的。

第三节 英国对中国香港地区的觊觎

香港地区位于珠江口外东侧,从17世纪开始,就成为英国人图谋夺占的岛屿之一。

1683年,英国东印度公司商船“卡罗利那”号从澳门到香港东面的大屿山贸易,在该地停泊两个月之久。这可能是英国人首次前来香港地区。

1689年,东印度公司派遣商船“防卫”号来华贸易,载货730吨,是截至当时英国来华贸易载货最多的一艘船。据他们向公司报告,该船曾于9月1日停泊在“澳门以东约15海里”处。美国历史学者马士认为,根据这个方位,“防卫”号很可能到过香港海域,特别是今香港维多利亚港西部的急水门,那里有很好的避风处所。

18世纪后期,英国殖民主义者在夺取槟榔屿的同时,据说曾有占领香港地区大屿山的阴谋。

从1806年起,东印度公司的水文地理学家霍斯伯格连续多年在华南沿海,包括香港一带洋面进行勘测。后来,他给英国外交部写了一份调查报告,其中多处提到香港水域的情况,指出:急水门西部是一个可供各种船只停泊的安全锚地,香港岛与南丫岛之间的东薄寮海峡也是良好的避风处和抛锚地。香港北面

的鲤鱼门形成“一个可容各种大小船只的优良海港，船只在战时停泊港内，把它们的舷炮对着海峡，可以抵御优势兵力，击退进犯的敌人。”此外，香港岛南部大潭港也是一个良好的避风港。霍斯伯格的报告表明，英国人在19世纪初期，已搜集了大量有关香港水域的情报，已对这方面的情况相当熟悉。

1816年，英国政府派阿美士德和士丹顿出使中国。士丹顿是东印度公司驻华代表，本来是住在广州，他与代表团约定在香港会合，一同北上。他们约会的地点在薄寮洲北面二、三里的香港瀑布湾。香港这个名称，第一次出现在东印度公司的档案里。1817年，阿美士德使团回国。英国的记载说：“这个地方显得特别重要是在1816年—1817年间阿美士德代表团进京的时候。他们到达中国，即在此停泊。在这短短停留的时间里，他们对这个港口和全岛作了仔细的调查。前者有海军将领们，后者有军医阿贝尔。当代表团回国的时候，他们提出了详尽的报告，盛赞这个地方的重要和天然的优点。他们说：‘从各方面看来，无论出口入口，香港水陆环绕的地形，是世界上无与伦比的良港。’不过这些话并没有发生实际的效果，恐怕是因为代表团遭遇失败，并没有实行进一步的扩张政策。”

实行扩张政策是殖民主义一贯的计划。阴谋夺取香港就是在这个时候提出的，因为条件还不成熟，所以没有进行具体的行动。

从19世纪20年代开始，东印度公司来华商船常在香港水域停泊。1826年，英国殖民主义者用20万两银子买通两广总督李鸿宾，占据香港附近的特山，作为“往来安歇地”。同时，英商又在广州商馆后面，擅自扩展地界，设立栏栅，妨碍居民往来交通。群众提出抗议，李鸿宾因为受了贿赂，置之不理。群众大怒，转告广东巡抚朱桂楨。朱桂楨即派人拆去栏栅，勒令收回特山。